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语言身份认同

○ 陈 睿¹, 胡 健²

(1.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2.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语言身份有利于社会整合,语言和语言身份将发挥它们的沟通和认同作用,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基于社会整合角度开展语言身份特征的分析,讨论语言身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具体关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依次建构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和全球化语言身份,五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关键词〕社会整合;语言身份;命运共同体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8.05.016

“人是类存在物,必然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要为人类整体的利益着想,要体现全球主义的精神。”^{〔1〕}中国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呼吁,“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2〕}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虽然并不积极,目前只关注异质团体如何互动的问题,着力培养区域内公民与异质团体的互动意识和能力,^{〔3〕}但是互动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必由之路。人际互动离不开语言,语言表征身份也建构身份。^{〔4〕}语言身份初步建立之后,可以区分出异质团体,也能够建构共同体。共同体和异质体之间的交流逐渐密切,最终将建构出覆盖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语言身份的核心作用就是沟通和认同。也就是说,语

作者简介:陈睿,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语言政策;胡健,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

言和语言身份将发挥它们的沟通和认同作用,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种与方言众多,语言身份复杂,语言身份认同和建构一直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当下,国家正在整合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的有生力量,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稳步实现。要想实现中国梦,复兴中华民族,就应该特别重视语言身份问题,有序引导语言身份建构,强化语言身份认同,树立语言共同体意识,藉此推动社会整合,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繁荣。

一、语言身份与语言身份认同的整合功能

身份是社会结构要素。^[5]相同身份的个体可以缔结社会组织,形成群体,稳定的社会组织和群体反过来又强化了个体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在社会整合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学术界多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领域开展相关研究,重点关注社会整合、人口迁移、文化变迁等要素在身份建构与认同机制中的作用;也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开展身份建构与认同研究,例如,布洛克关注语言身份问题的本质,^[6]皮特和默雷尔关注语言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7]陆小鹿则分析了语言策略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作用。^[8]研究者普遍认为,身份认同即语言认同,语言身份建构有益于社会整合。

语言是身份认同的媒介和载体,在扩大身份认同辐射圈以及增强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戈夫曼所言,社会规约要求人们使用有序交往的语言编码背景知识进行交际。^[9]在这个过程中,建构语言身份,促进语言身份认同。语言身份认同既包括个体身份的主观宣示,也包括对他者施加的客观确认。在语言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身份认同和社会整合同步完成。不过也要指出,语言沟通顺畅并不意味着彼此认同,只有认同才能保持语言身份构建的独立性,推动身份建构,强化身份认同。语言认同的形成是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语言地位的差异、语言资源的掌握和语言能力的强弱可能会导致语言身份认同发生改变。语言认同对象可以是通用语,也可以是非通用语。社会群体或个人通过具体使用的语言表达文化身份,文化身份的相似度越高,语言认同越趋于一致。人们会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选择相应的语言变体,形成特定的社会身份。语言选择是身份形成的基础以及表达身份认同的方式,语言变体传达了特定的社会形象或地位。相应地,人们总是试图靠近更具优势的语言,社会身份认同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统一整体。就身份认同辐射面而言,普通话辐射范围最广,它是中国公民身份认同的典型标志,凝聚了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覆盖了中国和其他希望融入的人群。中国的普通话政策是成功的,这是历史经验,也是现实智慧,在社会整合、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未来,应该将这种经验扩大,让这种智慧发挥更大的作用。

语言身份就是身份,它是社会语言实践的产物,强调个体语言的共同特点,是群体或个体自我认定与他人认定的互动结构,凸显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

所以,语言身份认同最能给人归属感,而语言身份认同本质上就是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具体行为的同质性过程,就是对社会给予各种语言变体的地位和看法的选择和接受的心理过程。

在社会转型的复杂环境下,社会阶层个体与群体有共同的需求,构建了复杂的性别、种族、地域、国家身份的语言认同。社会成员基于身份认同的语言实践活动,跨越种族、阶层。这种实践可以将不同社会特征的人凝聚起来,也可以让同一群体的人产生不同的身份认同,充分发挥语言的社会整合实效。

语言身份认同在求同的时候,也可以存异,凸现不同群体间语言的差异性。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组织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的差异性就是语言和语言身份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通过语言和其他指示符号加以表现。差异越多,适宜语言的出现就越有必要。适宜的语言不仅可以获得有效的身份认同和身份确认,而且有利于不同群体间的人际互动。

有了互动,就有望出现认同;认同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也可以促进互动。在社会阶层化、空间阶层化社会转型的复杂环境下,身份认同感成为全社会共同的需求。以前,人们可以凭借地域归属感而建构身份认同感。如今,人际交流与交往频繁,人口迁徙频度增大,这种认同感已经难以维系,只有紧密依靠通用语来建构身份认同感,才能推动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整合。

二、多元语言身份的建构过程与逻辑序列

身份建构是动态而且多样的,就认同过程而言,有个人身份建构,也有社会、民族、国家和全球化身份建构,分别强调个人身心体验、社会归属、民族社会建构、国家语言内化和全球共同体的建构。五种语言身份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地建构出来。个人语言身份建构是基础,社会、民族和国家语言身份建构是目的,全球语言身份建构是方向。

(一)个人语言身份建构是基础

认同是个体行为,是由行动者个别化的过程建构的意义。^[10]个人身份认同关注个体自身的身份定位,是个体认知和谐的重要前提。有了个人身份认同,才能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才有望形成良好的社会互动和社会整合。语言身份认同的基础正是个人语言身份建构。

说话者通过自己的语言建构、维持以及区分自己的社会属性界限和身份,^[11]个体身份与其使用的语言、意识形态及社会背景有关,通过切换语言口音和风格,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可能会表现出多重身份认同。一方面,在社会多语言、多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个人语言身份认同增强,可以帮助个体形成强烈的归属感。另一方面,语言的混合又赋予使用者多重身份和意义,有利于社会互动和融合。普通话或特定方言可以让原本不属于同一群体的个体拥有共同语言,具备了同样的身份和身份认同。显然,这将有利于社会整合,而不需要付出额外成本。

语言和个体身份之间联系紧密,为了得到本土语境中成员的身份,个体必须能够使用与该群体的语言行为规则相一致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遮掩了具体社会实践中不同个体的不同权利和地位,帮助外来者实现身份的重构。^[12]这不只是个体的胜利,也是整个社会的胜利。因此,个人语言身份建构有助于社会整合,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和谐、繁荣,也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当然,个体通过共同语言或特定语言获得一种身份认可的时候,并不能彻底消弭自身与新身份以及与这个新身份的旧有身份之间的差异。即使新的语言身份认同已经建立,这个身份还要受到表现社会地位、权势关系的社会语言身份的影响和限制。社会语言身份是一种不可低估也不可移除的力量,可以强化个人语言身份和认同,也可以消解它们,让一切归零。

(二)社会、民族和国家语言身份建构是目的

自1900年前后梁启超提倡建立民族国家之后,^[13]中国人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如今,民族国家早已建立,民族国家的语言身份也初见规模,但是如何完善并优化这种语言身份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民族国家的语言身份建构,除了建构个人语言身份之外,还要建构社会、民族和国家语言身份。社会、民族和国家语言身份的建构是目的,也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

个体对自己进行群体身份评价和分类,形成了社会身份。^[14]作为社会身份的社会语言身份十分重要,它虽然离不开个体,是个体的一种属性,但又不只属于个体。个体通过语言建构社会关系,与他人沟通、协商,展现身份特性,获得身份认同。言谈之间,语言的社会功能得以显现,社会语言身份得以建构。

语言差异塑造了语言身份的差异,反映了不同语言使用者群体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不同认知。社会语言身份体现了文化心理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性。不同的思维模式造就了各不相同的语言结构,体现了各不相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产生各不相同的语言身份、语言信仰。有的人鼓励个人语言自由,有的人坚持国家语言价值取向。无论哪一种观点,都会影响言说个体的具体社会实践。社会语言身份造成鸿沟,阻碍社会整合的开展。言说个体可以随意选择语言或方言,并且在一定时间内说得惟妙惟肖;言说个体也可以相对从容地建构新的个人语言身份,但是,很难改变自己的语言信仰、语言结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

当语言信仰、语言结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不利于社会整合之时,有必要研究其成因,分析其内部结构,把握其要害,有意识地加以约束、调整或重置。因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个体、社会和国家对自身的发展都有了更高要求,个体的社会身份逐渐变得复杂多样起来。新的社会语言身份既然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权势关系,那么,言说个体就不得不调整心态,改变语言结构、语言信仰,甚至改变思维模式,减少不同文化心理的阻碍,与异质语言群体相接触,接受使用另一种语言或方言,形成积极的社会身份。

第二语言的学习动机一般都很鲜明,就是为了让学习者取得本族语群体的

认同,融入目标语群体。^[15]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社会价值相对较高,体现了语言资本的经济社会化。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想利用语言学习和竞争,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更为有效和有利的社会身份,只能被动或积极主动地接受这种社会语言身份。

个体对主导语言和次级语言的态度体现了不同社区和社会群体、社会权势间的互动。一般情况下,后天的社会语言身份认同受制于强大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容易帮助个体在群体和地域的语言文化中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

当前,中国的区域人口流动量异常庞大,国家和社会亟须为这些流动人口提供相应的语言服务。这已经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以及社会治安的稳定、人口素质的提高。普通话的推广使用有助于外来人口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有助于他们形成共同的语言身份认同,增强言语社区的凝聚力,促进了语言的接触和融合,已经成为民族语言身份建构的基石。

各种方言及其变体是社会语言身份建构的障碍,也是映射社会意义的语言资源,更是不同区域文化的载体,具有潜在的经济资本、文化价值;它是同地域之间群体身份认同的标识,凸显了与其他地域人口之间语言身份的阻隔,也是社会语言身份建构的宝库。加强方言及其语言变体的调查、研究和审视、反思,不仅有助于强化个人语言身份,也有助于推动地域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与融合。一旦方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性得以揭示,地域文化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性也就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必将有利于个体的自我呈现,有利于人际互动、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更重要的是,共性和差异性的揭示有助于提升个体的言说能力,推广普通话,强化人的社会语言身份,还有助于强化个体的民族身份认同,有助于建构民族语言身份认同。

语言是民族自我认知及民族边界建立的基本特性。^[16]语言是族群的纽带,是最重要的民族认同要素、身份标志及社会认同的象征。自古以来,中国就形成了汉族为主体,各少数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建构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进程中,语言作为民族划分依据之一,推动着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既包括各民族丰富的语言和方言的个性认同,又有共同使用的普通话的共性认同。

语言身份认同是民族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反映了本民族文化或社会历史的趋同心理素质。从远古时期的华夏族,秦汉初步统一至今,通用语随着民族间不断地征战、交融和衍变,从夏商甲骨文至各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兼收并蓄形成普通话,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语言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

必须要指出的是,古代中国使用“官话”,今天的中国人普遍使用普通话,每个时代都有共同语,共同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虽然存在社会权势和地位差异,但是语言资源价值的不平等特性并没有给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带来伤害,更没有损害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

少数民族语言有助于该族群成员构建积极的身份认同,基于民族认同的自我选择,趋向于维护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贴近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及日常生活方

式。不同民族的语言社会实践反映了各自民族认同,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和保护。部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少数民族,通过社会交往传承语言,也可以增强民族语言身份认同,构成族群内外的交往基础。民族语言凝聚了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是增强族群成员的归属感和自信心的关键所在。在与他族接触的过程中,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语言进行比较,突出了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族语身份之间的区别,有利于少数民族语言认同和语言身份建构,也有利于催生强烈的社会归属感。

随着信息化的加深、族群流动的加快,有些少数民族语言已经濒危,甚至有些语言已经消亡。保护濒危的民族语言,维护民族语言认同,妥善处理各民族语言身份的需求,就成为国家层面的大问题,因此需要讨论国家语言身份认同及其建构的问题。国家是公民的主要身份认同对象,身份认同有助于加强国家凝聚力和认同,公民权利、义务的合法化都是基于国家的集中化权威,其核心在于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平等,维系着各民族团结与稳定。

国家是通过相同感团结在一起的假想社区,^[17]这种相同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成为该国成员共同使用的通用语构建起来的。国家的宏观语言政策背景下,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因素,多语交互的局面在不断融合和演变,国家机构语言政策呈现出社会与国家的不同理念及语言实践。在多民族国家精神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经常会面临与国家语言身份具有差异性的多民族、多元化语言身份认同的挑战。

然而,国家层面的语言意识和语言规划的实施,呈现出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这种语言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化的国民生活和民族身份认同感。政府机构的权威促使公民接受标准和规范化的语言,个体多样性和创新性的语码选择就会受到干扰,出现语言混杂的现象。这是所有主权国家都要思考和应对的问题。

未来应该关注个人语言自由和权力,警惕语言融合产生的缺陷,积极寻求制度范围内多元语言政策的可行性。既不能让权力与语言资源过密联系,也不能让语言资源与经济效益联系过密,经济压力之下的语言政策很难公平。只有当国家语言期望逐渐内化为公民的自身语言期望,通用语的推广和置顶才得以落实,国家语言身份认同和建构才能真正实现。这些一旦得到落实或实现,社会整合就朝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全球语言身份建构是方向

全球化呈现了多领域、多层面与多维度的多重身份建构的特点,^[18]多维度的全球身份认同是全球人类共同体,超越了国家地域疆域和文化隔阂。^[19]语言的全球化传播既是国家实力的展现,也是国家利益的拓展。趋同的语言作为独特的社会共同体身份标志,可以对社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产生影响。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汉语言的全球化正在成为现实。建构全球语言身份,有利于我们实施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整合,实现民族复兴。值得警惕的是,全球化正在促进语言、文化资源的流动,跨文化、跨地区的交往频繁自由,人们很

快就能够全面接受国际化、没有差异的生活方式和理念,重新建构全球化身份认同。因此,我们要注意国家语言安全,未雨绸缪,保护和利用好本国的语言资源,平等地使用其他国家语言文字,保持全球语言身份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随着经济和科技要素全球化的流动,不同国家文化间的交流容易产生趋同现象,主要出于对某种共同价值的追求超越了民族国家传统文化观念,形成人类的共同文化。通用语言认同的增强,可能引发普遍的认同危机与文化焦虑。人类生活将面临身份群体多样性以及不确定性,文化交往和冲突随之而来,给世界秩序、地区及国内的治理难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定要提防别国语言的渗透,满足国民的民族身份诉求,保护弱势和边缘群体的语言权利,保障本族民族语言主权。身份认同容易被物化成社会存在的符号,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本身物质内涵的同时,还将消费商品所象征社会的身份符号价值。^[20]面对生活在中国的外国消费者,不少中国人开设的店铺也用外文,便于知晓该店所提供的业务,凸显他国的国家特色,迎合或满足当地外国以及想体验外国风情的中国人的心理需求,以吸引他们来消费。然而,经常到国外旅游的中国人不难发现,外国商家或个人创设的标牌显示自身对自己国家语言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固守,期望通过本国的语言文化特征来获得同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两相对比,未来中国还需要强调全球语言身份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总之,语言身份认同要在公平的基础上兼顾效率,重视个体语言身份认同的基础作用,关注社会语言身份认同的变化状况。个人语言身份建构是民族语言身份建构与认同的基础,也是国家语言身份建构与认同的先导。国家语言身份建构与认同应保障国家语言生活的整体需求,在此基础上推动全球化语言身份的建构。全球化语言身份建构固然是推动社会整合的强劲动力,但是也要提防它消解和破坏身份建构的负面能量。

三、语言身份认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础

语言身份建构与语言身份认同并不是一回事,在建构上述五种语言身份的同时,必须同步建立语言身份认同。语言身份认同一旦实现,就会形成一定的语言态度,增强个体使用语言的能力,促进语言身份的后续建构。语言身份认同首先是个人的事情,受个体种种情性的影响,其后还会受到社会、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影响。未来需要调动国家意志指导个体语言身份建构,确保各种语言或方言都有生存和互动空间,规范个体语言实践,确保五种语言身份持续发生作用。只有这五种语言身份相互配合,协调一致,长期互动,社会整合才能收到切实效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才有望实现。

(一)语言身份认同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语言的变迁由社会环境决定,各区域的语言认同变化带有标志性特征,反映民族交流、记忆历史与文化传承。从事物发展的逻辑脉络上分析,社会环境的变化受制于个体语言身份的建构。积极的语言身份建构起

来之后,语言生态随之发生变化,有助于社会整合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语言接触是语言认同变化的主要因素。个体语言身份建构完成之后,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传播开去,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良好的社会整合就像语言现象一样可以观察。历时层面的观察可以了解区域语言状况的历史演变,以及不同时期不同语言的地位变迁。在这个变迁过程之中,语言身份之间的权势关系发生变化,社会语言实践随之变化,社会风气也随之改变。社会风清气正,国家就能实现和谐、包容,语言之间的权势关系大大减少,民族、国家内部的矛盾也随之减少。

在这种和谐的社会中,国家不再需要以强制的方式推行共同语意识,国家和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社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受此影响也会发生根本变化。具体而言,中国将在继续保证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自由的前提下,大力推广汉语普通话,发挥跨文化语言认同的交流功能,构建跨民族的身份认同凝聚力。随着以学校为基地的汉语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孔子学院的大力推广,普通话更加普及,汉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更容易被其他兄弟民族和外国人所接受,中华民族的身份特征也将越来越清晰。

普通话在更大范围内的普及,并不影响其他语言或方言的发展。因为个体语言身份建构首先是个体的,个体语言身份建构首先建构的是本民族语言身份或本地方言身份。由此形成多元化身份认同感,既有个人语言身份,又有其他语言身份。这些语言身份都将象征国家软实力,彰显国家的标记功能,成为国家利益的新代表,强化国家认同,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有助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和谐相处,有利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语言身份认同优化人类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

身份认同可以通过媒体的传播方式来实现,^[21]新媒体的出现强化了这种认同。五种语言身份建构直接推动了人的身份多样化,人口流动速度因此加快,人才结构发生变化,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也随之变化。

信息化和智能时代,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身份各异的语言表达的媒介和渠道获得更多的信息来源,以电视、电脑、手机等作为终端的媒介给不同群体的交流提供了方便。国家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因此而有所减弱,人们更倾向于能够使用语言自由表达思想和交换信息的平台,如微信、微博等。这些变化虽然增加了身份识别的困惑,使社会集体认同感相对弱化,但是,人不再局促在一个小范围之内,而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人和事发生直接的关联。特别是全球化语言身份的确立,让个体有了世界乃至宇宙这个及时且广阔的舞台,可以及时接受信息,并将其转化为知识和智慧,化作实际行动。

这个时候,具备多重语言身份的个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他们都是良好运转社会优秀的产业工人,具有优秀个人特质,能够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能够优化生产结构,提升国家的全球竞争力。

(三)语言身份建构突出了人类世界的核心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双重背景下,我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城市逐渐全方位地开放。经济全球化开放的现代经济和市场交换体系,加深了社会变革的力度,社会资本流动朝向纵深发展,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进一步分化,冲击了社会现代化背景下的集体语言身份认同感,降低了民众的社会参与度,强化了民族和宗教层面的认同感,更多的身份被不断地构建起来,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居民的语言生活、意识形态。

经济全球化交流中必然会产生语言碰撞与冲突。语言资源与经济效益紧密联系,通过增强各群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的能力,强化其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经济压力之下的语言政策是语言意识形态分化为主导和从属的基础。弱势和边缘群体往往从经济利益角度来选择学习官方语言,获取更多的机会。

五种语言身份的建构可以改变这一糟糕的现状。多重身份能够唤醒每一个个体系统思考、团队合作的能力,可以通过多重身份建构进行社会整合,重塑主流核心价值观。这种整合是一种高质量的整合,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整合,不再需要外力的介入,从而大大提升了个体身份的贡献值与附加值,构建相对稳定的身份认同模式,不同群体被纳入到一体化之中,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内在需求和身份标志。

四、结 语

在多民族多语言国家的社会整合进程中,结合我国现行的语言政策,从个体、社会、民族、国家和全球层面,讨论了语言身份建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人口流动频繁,新的身份群体层出不穷,多元语言身份已经成为民族融合与交流的工具。国家应该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制定国家语言战略,以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促进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国内外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全球身份认同。

第二,现代化、城市化、区域化快速发展,语言身份的多元与分化程度加深。全球语言共同体的建构,需要提升社会整合的现代化水平,有意识地培养民众公共文化精神,提供符合身份需求的语言服务和产品,使得各语言身份群体都能平等参与和共享社会改革和发展机遇。

第三,突出语言身份认同在建设全球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整合作用。语言身份认同的构建与有效的社会整合有利于社会的团结、稳定。在构建全球和谐社会、完成人的更高级别的现代化的道路上,语言以及语言身份的建构特别重要。全球语言身份的确立有利于社会互动,实现全球资源整合、开发与利用。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蓝图需要不同群体的多种语言身份认同,也需要建构全球语言身份,强化全球语言身份认同。全球语言身份的建构与认同应以政府为主体,调动社会成员的参与积极性,强化全民语言意识,形成多元语言身份认同体系。有了这个认同体系,特别是有了全球语言身份认同,就可

以树立人类语言共同体意识,促进国家及世界各民族的团结稳定和共同发展。

注释:

- [1]漆思:《“天下”思维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世界责任观》,《世界哲学》2007年第1期。
- [2]《中国的和平发展》,http://www.scio.gov.cn/ztk/dtzt/58/3/document/999959/999959_4.htm.
- [3] OECD. *The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key competences; executive summary*; DeSeCoproject, 2005:pp.12-13.
- [4][7] Peter, C. & MURRELL, JR. *Identity of Achievement in Multicultural Urban School*. New York ·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7: pp.16-130.
- [5][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6页。
- [6]Block, D. *Second Language Identities*.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7: pp.26,40.
- [8]陆小鹿:《语言选择和身份认同——基于社会认知语言学视角》,《外国语文》2015年第6期。
- [9]Goffman, E. *Facons de Parler*. Paris: Minuit, 1987: p.145.
- [10]Giddens. *Anthony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45.
- [11]黎红:《语言同化与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
- [12]董平荣:《试论语言与身份研究活动中话语分析的整合视角》,《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年第7期。
- [13]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第393页。
- [14]王德春:《多角度研究语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 [15]Giles H, Johnson P.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Formation*. Intergroup Behavio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 p.16.
- [16][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页。
- [17]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2006: p.91.
- [18]J. Resnick, *Alternative Identities in Multicultural Schools in Israel: Emancipator Identity, Mixed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6: pp.585-601.
- [19]H. Arrow and N. Sandberg, *International Identity: definitions, development and some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conflict and peace*, In B. N. Setiadi, A. Supratiknya, W. J. Lonner, and Y. H. Poortinga (eds.), *Ongoing Themes i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Online Ed.)*, Melbourne, F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 - Cultural Psychology, 2004: p.76.
- [20]王岳川:《消费社会的权利运动》,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
- [21][法]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